



唐代文學隅論

趙睿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唐代文學隅論

趙睿才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唐代文學隅論 / 趙睿才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9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ISBN 978-7-5325-7385-1

I. ①唐… II. ①趙…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研究—唐代 IV. ①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87105 號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

唐代文學隅論

趙睿才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 × 1240 1/32 印張 16.875 插頁 5 字數 420,000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600

ISBN 978-7-5325-7385-1

I · 2851 定價: 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本書係山東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出版說明

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聞一多、梁實秋、楊振聲、老舍、沈從文、洪深等為代表的著名作家、學者，在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以馮沅君、陸侃如、高亨、蕭滌非、殷孟倫、殷煥先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以丁山、鄭鶴聲、黃雲眉、張維華、楊向奎、童書業、王仲榮、趙儷生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但是，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和國內其他重點高校一樣，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銳挑戰。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

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漢語言文字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中國古代史、科技哲學、文藝學、民俗學、中國民間文學等。主要從事科研工作，同時培養碩士、博士研究生。知名學者蔣維崧、王紹曾、吉常宏、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成為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

興滅業、繼絕學、鑄新知，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是本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正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編輯

的研究叢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歡迎海內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2003 年 10 月

【附記】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在過去 10 年中已陸續編輯出版 5 輯 19 種 28 冊，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和好評。2012 年 1 月，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2002 年成立）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2010 年成立）、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2005 年成立）、《文史哲》編輯部整合組建為新的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研究院”名稱同時使用），許嘉璐先生任院長，龐樸先生任學術委員會主任。目前全院共有教職工 65 人，在讀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258 人，另有尼山學堂古典實驗班本科生兩屆 47 人，在研博士後 23 人，科研教學事業都有長足的發展。本院一如既往，以中國古典學術為主要研究範圍，其中尤以儒學研究為重點。鑒於新的格局，《專刊》名稱改為《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在前 5 輯之後繼續編輯出版。歡迎海內外朋友提出寶貴意見。

2013 年 10 月

前言

杜甫當年在談自己的創作經驗時曾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題》）本人於此特有會心，從最早發表於《文史哲》的《李白與陶潛詩風比較研究》，到發表於《圖書館雜誌》的《〈宋本杜工部集〉版本源流考辨》，都是嘔心瀝血的結晶。唐代文學是一座文化寶庫，歷代都有大家、名家淘寶於其中。就目前研究狀況而言，其研究隊伍龐大，梯隊健全，文獻資料整理全面而深入，研究成果系統而豐碩。本人將十餘年來的學習、研究心得結集為《唐代文學隅論》，聊以湊湊熱鬧；本來就是“隅論”，在學術長河中極其微不足道，能獻丑於世已屬萬幸。

“隅論”集錄了本人論文 26 篇，附錄 5 篇是與恩師張忠綱先生合作完成的。敝以為，論文皆能充分利用文獻資料解決具體的學術問題，對唐代文學研究中的許多問題提出了些許新見。“隅論”主要涉及杜甫研究、唐詩與民俗關係研究，以及唐代經典作家如李白、王維、李賀等的專門研究。

“隅論”的第一個重點是關於杜甫研究的，既闡述了聞一多、馮至、蕭滌非先生的學術貢獻，又考證了《宋本杜工部集》、朱琦《杜詩精華》的版本源流，又綜合論析了杜甫的節令詩。如將聞一多先生的杜甫研究寫成了《治杜的態度：瞭解之同情》和《治杜的結果：真瞭解》兩文，聞先生既以堅實的舊學作其依託，又有新眼光、新方法及新文藝的感染力，于杜多有發明，最精闢的觀點是杜甫代表了“文學與良心兼備”的盛唐文學。馮至先生的杜甫研究獨樹一幟，他以先進的文學史觀，開闊的學術視野，把杜詩“當作一

個整個的有機體來研究”，具體操作中不被煩瑣的考證與論據所累又不輕視考據，本人將之歸納為“筆路藍縷，以啓山林”的開創之功。將蕭滌非先生的學術貢獻概括為“兩座豐碑”，即《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與《杜甫研究》。《我於古文學，特愛少陵詩》一文，以“瞭解之同情”的態度詳細梳理了山東大學杜甫研究學統的變遷，評析了聞一多、蕭滌非、張忠綱先生一脈相承的杜甫研究學統及張忠綱先生承上啓下的重大作用。《宋本杜工部集》是後來所刊行的各種杜集的祖本。《〈宋本杜工部集〉版本源流考辨》一文，從避諱學角度探討了這樣的問題：嘉祐本（即二王本）摻入了它前後其他行世杜集的成分，紹興本（即吳若本）也摻入了它前後其他杜集的成分，而問題就出在毛鈔本上。朱琦的《杜詩精華》是杜詩的一個孤本。《一個杜詩孤本的發現》一文，不僅考查了朱琦其人，還發掘了《杜詩精華》的學術特點：推尊漢魏樂府，以漢魏樂府、“選體”為准的，側重於杜詩藝術性的分析。《杜甫節令詩論析》（上下）從兩個方面，即（一）風俗畫卷與時代精神和（二）情聖的嗟歎與稷契之志展開，全面探析了杜詩高不可攀的境界，和貫穿於其中的“天地良心”。

“隅論”第二個重點是關於唐詩與民俗研究的，從一個新的視角闡釋唐詩繁榮的原因。文藝理論中有一個為人熟知的命題：文學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可是我們現在來考察唐人的“生活”是難度較大的，也是較“虛”的，似乎不如“民俗生活”來得更直接、更“實”一些，因而從民俗學視角來審視、研究唐詩，必定會有這樣的結果，即“唐詩：唐人文化生活與生活文化的結晶”。對於唐代士人習業山林寺觀風尚的分析，近現代以來一直有零星的研究，如嚴耕望先生的《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可是迄今為止尚沒有比《功名的渴求與學術的自覺》一文談得透徹的，既探討了此一風尚的成因、特點，又論析了它與“子學”的關係：唐代士人在追逐功利的同時，自覺或不自覺地刺激了學術的繁榮和唐代士階層的自

覺。盛唐的嗜酒風尚和奔騰詩風的關係歷來爲人們津津樂道，可是，中唐以後出現的好茶風尚對內斂詩風的影響，卻少有人論及，《中晚唐茶、詩關係發微》一文，則對二者關係挖得相當深透：茶的“清新”特性與中唐詩歌的“變新”，在趨新尚異的社會背景與時代精神中、在文人與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使得中晚唐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爲主特徵的審美趣味，具體表現爲：清、寒、瘦、硬、苦，並對尚理主意的宋詩產生了影響。與前代的挽歌相比較，唐人的挽歌本質上說是贈獻挽詩，它成熟的標誌是程式化，《贈獻挽詩之程式化——解讀唐代挽歌》一文對此作了深入的解讀，並歸納了四個特點。紙錢，在上千年的中華祭祀文明中扮演了特別的角色，《“紙錢”考略》一文考察了紙錢的源起、計量、稱謂，對其功用和存在的意義作了富於人情味的解析。敦煌是座文化寶庫，敦煌民間婚俗是中國古老的華夏文化與胡族遺風的產物，既古樸又活潑。《敦煌寫本〈下女夫詞〉的民俗解讀》一文經過分析認爲，《下女夫詞》便是其中一朵“婚俗奇葩”。長江流域的水運貿易歷史悠久，唐代長江貿易異常繁榮，其主幹綫可以概括爲“三點一綫”，即以長江幹流爲主綫，自東向西連綴三個繁華的大都市：揚州、江陵、益州，在中唐經濟重心南移的過程中，它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利在舟中——唐詩視域下的長江水運貿易》一文，即以唐詩爲中心，勾勒出唐代長江流域的貿易狀況，唐詩可補史料的不足。

“隅論”第三個重點是關於李白、王維、李賀、王國維等專門研究的。李白與陶淵明的詩風很少有人作過比較研究，似乎無可比性，可是《李白與陶潛詩風比較研究》一文以爲，李以狂爲主、陶以狷爲主的人格分別孕育出了“清真”與“真”的詩風，“真”是其共同點。“情真”、“性真”的差異，表現出“清水芙蓉”與“清雄奔放”和“平淡之真”與“豪放之真”兩個對立統一的藝術追求。《李白〈臨路歌〉與孔子“臨終歌”比較研究》一文從內容、形式兩方面論述了

李白《臨路歌》與孔子“臨終歌”的淵源聯繫。李白在臨終之前引孔子為知音、以孔子思想為旨歸的表白是較可信的，則孔子之“泣麟”與李白之“悲鵬”出於同一機杼：生不逢時，壯志難酬，字裏行間昭示著悲壯之美，其悲壯不亞于一首英雄史詩。《“飲中八仙”的演化與李白為“翰林供奉”的時間問題》一文考證了李白在開元、天寶間兩入長安的史實與“飲中八仙”的演化互為佐證，分野於開元二十六年的“翰林供奉”與“翰林學士”，及此年前後李白仍在長安為“翰林供奉”的史實告訴我們：開元間李白確實到過長安，寓居時間在十年左右。這一考證結果，與傅璇琮先生的結論不謀而合。《妙慧：空寂與貞定體驗的指歸——王維詩歌松石意象發微》一文揭示：王維詩中的“松石”意象深受佛、道典藏譬喻、暗示的影響，象徵著一種與喧囂抗衡的靜止的貞定的力量，是詩人契道的心靈語言。這種貞定妙境的獲取，經歷了由喧囂到空寂，再由空寂到貞定的宗教、審美體驗過程，是經驗此美感的主體生命所經歷的抽象體驗之呈現，即牟宗三先生所謂的“妙慧”。《發掘自己的靈魂——長吉詩理闡釋》一文以具體的賀詩意象證明：長吉歌詩是一個天才詩人的自敘傳，其詩理則是自我發掘了被殘酷現實扭曲了的靈魂，因而美感與道德相悖，妍麗與可怖並存，美與醜對出，構成了長吉詩理的審美內核。《人間詞話》論李煜詞之辨析》一文強調了：須在靜安先生的整個美學理論體系中來考查他論李煜詞的言論，四則材料只是作為其“境界”之“真”的幾個論據出現的，有意拔高不是科學的態度；即使放在其美學體系中也存在著某些不可回避的矛盾。

除以上三個重點之外，本人還寫有如下三文，亦略見考據功力。《朝鮮李朝正宗李祹所纂中國文獻類考》一文，在李祹好尚中國傳統文化的前提下，分類縷析了他在接受與傳播朱熹哲學、杜陸律詩等方面的實績，對朝鮮中後期的思想、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教坊記〉作者崔令欽生平事蹟新考》一文深為崔令欽生平事蹟

可資稽考、依靠的文獻有限而遺憾，以可靠的材料證明他生跨玄、肅、代、德宗四朝，並基本縷清了他的履歷。《〈顏氏家訓〉用語與顏師古〈漢書注〉互證舉隅》一文，舉例證明了《顏氏家訓》之《勉學》、《書證》與《漢書注》在用語方面的淵源關係。需要指出的是，附錄中的五文都是在雜誌上發表過的，以維持原樣為好。

杜甫當年期望跟李白“細論文”：“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本人也期待著誠心關懷我、幫助我的師友多給以教誨，鞭策我前行。

目 錄

前言	1
----------	---

卷 一

李白與陶潛詩風比較研究	3
李白《臨路歌》與孔子“臨終歌”比較研究	16
“飲中八仙”的演化與李白爲“翰林供奉”的時間問題	28
妙慧：空寂與貞定體驗的指歸 ——王維詩歌松石意象發微	40
發掘自己的靈魂：長吉詩理之闡釋 ——從李賀“白玉樓”夢談起	58

卷 二

我於古文學，特愛少陵詩 ——山東大學杜甫研究學統的變遷	75
唐詩：唐人文化生活與生活文化的結晶 ——民俗學視角看唐詩	105
功名的渴求與學術的自覺 ——唐代士人習業山林寺觀風尚探析	132
中晚唐茶、詩關係發微	148

贈獻挽詩之程式化

——解讀唐代挽歌 170

《人間詞話》論李煜詞之辨析 184

卷 三

敦煌寫本《下女夫詞》的民俗解讀 199

“紙錢”考略 205

風俗畫卷與時代精神

——杜甫節令詩論析(上) 223

情聖的嗟嘆與稷契之志

——杜甫節令詩論析(下) 239

利在舟中

——唐詩視域下的長江水運貿易 253

卷 四

治杜的態度：瞭解之同情

——聞一多先生的杜甫研究(一) 271

治杜的結果：真瞭解

——聞一多先生的杜甫研究(二) 284

筆路藍縷，以啓山林

——馮至先生的杜甫研究 300

平民靈魂歷史的提煉與濃縮

——讀蕭滌非先生《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316

一代大師，兩座豐碑

——蕭滌非先生的主要學術貢獻評述 334

卷 五

朝鮮李朝正宗李祹所纂中國文獻類考	349
《宋本杜工部集》版本源流考辨	363
一個杜詩孤本的發現	
——朱琦及其《杜詩精華》	376
《教坊記》作者崔令欽生平事跡新考	406
《顏氏家訓》與顏師古《漢書注》用語互證舉隅	
——以《顏氏家訓》的《勉學》、《書證》篇為中心	415

附 錄

20 世紀杜甫研究述評	429
新時期杜甫研究述略	450
新時期大陸韓愈研究述評	474
杜甫研究綜述(1998 年)	497
情寓其中	
——唐人離別方式的民俗觀照	511

卷 一

李白與陶潛詩風比較研究

摘要：“風格就是人”。李白、陶潛的詩真率地展示着其人格。李以狂爲主、陶以狷爲主的人格分別孕育出了“清真”與“真”的詩風。李、陶的詩酒沉醉是悲壯的、審美的，其旨歸分別是“清水芙蓉”與“清雄奔放”和“平淡之真”與“豪放之真”兩個對立統一的藝術追求。雖有“情真”、“性真”的差異，而李、陶以富有“真情”的詩歌，對諱避“真情”的儒家詩教作了强有力的反撥却是共同的，並以此臻於不朽。

關鍵詞：狂；狷；清真；真；反撥

李白與陶潛以其獨特的詩歌創作，爲中國詩壇塑造了兩座不朽的紀念碑。李以狂爲主、陶以狷爲主的人格，分別孕育了相應的審美歷程：沉醉→孤憤→悲壯；沉醉→孤憤→悲壯→“逃走”。同時創造出了相應的詩風：李詩“清真”統攝下的“清水芙蓉”（柔美）和“清雄奔放”（壯美），陶詩“真”前提下的“平淡之真”與“豪放之真”。“清真”與“真”的不同點是前者側重於情真，後者偏重於性真；相似點是表現於創作客體的真樸自然和創作主體的“真意”、“真心”、“真骨”、“真趣”和“真情”。李白以奔放的狂氣抒發“真情”，陶潛用內斂的意趣舒揚“真情”，二人都用心靈感知自己，對排斥“真情”的儒家詩教作了强有力的反撥。

一、狂與狷的人格取向

狂與狷屬於同一倫理及審美大範疇，源自孔子：“不得中行而